

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

黄嘉树 著

陕西人民

社

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

黄嘉树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0062391

G719.2

H846

SBK03/02

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

黄嘉树 著

•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和平门外标新街2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30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10

统一书号：17387·16 定价：2.30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酝酿和成立(—1917年)...	(5)
第一节 近代中国思想家们所关注的两个问题.....	(5)
第二节 蔡元培、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理论的探索...	(9)
第三节 “职教救国”论的提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 的成立.....	(17)
第二章 为时代潮流推波助澜 (1917 年—1925 年)...	(22)
第一节 “五四”前后(上)	(22)
一、社的理论建设与办学实践.....	(22)
二、中国职教理论与欧美职教理论的关系.....	(31)
三、“职教救国”思潮的进步意义及其局限性...	(36)
四、职业教育的大发展.....	(39)
第二节 “五四”前后(下)	(45)
一、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45)
二、赞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55)
三、“兼收并蓄”式的政治倾向.....	(58)
第三章 在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旗帜下 (1925 年—1931 年)	(67)
第一节 大职业教育主义.....	(67)

一、大职业教育主义产生的背景	(67)
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	(73)
三、农村改进理论	(75)
第二节 “参加政治活动,以增实力”	(79)
一、《生活》周刊始末	(79)
二、与国民党政权的“龃扭”关系	(85)
第三节 职教事业的曲折进展	(91)
一、职业指导的发展与职业学校的困境	(91)
二、农村改进区的开辟及其意义	(95)
第四章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1931年—1937年)	(102)
第一节 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102)
一、呼吁抗战和支援抗战	(102)
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	(107)
三、抵制日货,推行国货	(110)
第二节 对国民党内政方针的批评与抵制	(111)
一、批评“剿共”方针,同情社会主义	(111)
二、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119)
三、“希望和请求取消党治,实现民治”	(121)
第三节 职业补习教育与劳工自治区	(124)
一、职业补习教育的大发展	(124)
二、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区	(129)
第四节 放弃“职教救国”旗帜	(134)
一、职业教育的经济基础濒临崩溃	(134)
二、国民经济衰败对社办事业的影响	(137)
三、“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职业教育	

亦无办法”	(145)
第五章 在抗日烽火中获得新生命	
(1937年—1945年)	(147)
第一节 战斗在抗日第一线	(147)
一、参加“八·一三”抗战	(147)
二、坚持“孤岛”斗争	(151)
第二节 “大后方”事业的进展	(157)
一、总社内迁与内地各分支机构的设立	(157)
二、总社及各办事处的主要工作	(160)
三、内地工作中出现的几点变化	(173)
第三节 教育应当跟着政治走	(179)
一、与共产党团结合作	(179)
二、昆明会议与国讯同志会	(186)
三、统一建国同志会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1)
四、为民主宪政而斗争	(197)
第六章 迎接新中国 (1945年—1949年)	(211)
第一节 三项重大的政治行动	(211)
一、黄炎培、冷遹等访问延安	(211)
二、《延安归来》的出版与“拒检”运动	(218)
三、与有关各方共同创立民主建国会	(225)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机构调整与事业进展	(231)
一、各机构的归并调整	(231)
二、比乐中学与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	(236)
第三节 迎接新中国	(241)
一、力促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241)
二、维护政协决议的斗争	(244)

三、放弃中间立场，转向“一边倒”	(250)
四、坚持斗争，迎接解放	(256)
第七章 矢志报国，重放光彩（新中国成立以后） ..	(265)
第一节 社的事业“化私为公”	(265)
一、“化私为公”方针的提出及其逐步实现	(265)
二、“化私为公”过程中的偏差与失误	(273)
三、“化私为公”后社的性质与任务	(280)
第二节 新中国函授教育的开路先锋	(285)
一、函授教育与北京函授师范学校	(285)
二、中华函授学校与语文学习讲座	(290)
第三节 黄炎培逝世。社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停 止活动	(292)
第四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职教社重放光彩 ..	(297)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297)
二、在党的关怀下重放光彩	(302)
附录	(316)

前 言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由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国务活动家和卓越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发起成立的。它诞生于1917年5月6日，迄今已度过了近七十个寒暑，在我国现有的上万个社团中，它是历史最为悠久者。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它在近七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办学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一套以职业陶冶、职业学校、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等四个环节相衔接的系统的职业教育结构，并在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农村教育、业余教育等各个教育领域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它积累的教育经验，特别是职业教育和农村教育经验，是我国教育事业中的一笔宝贵的民族财富，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光大。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个知识分子的团体，有很多著名学者和专家先后参加过它的组织或活动，如黄炎培、蔡元培、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黄齐生、刘湛恩、马寅初、沈思孚、江问渔、杨卫玉、潘序伦等，至今健在的则有叶圣陶、费孝通、吕叔湘、千家驹、孙起孟、宦乡、李文杰、李正文等。该社的干部、社员和校友中，学有所长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社会声望者更是多得难以列举。从这个社团的活动中，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也可以通过这些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演进轨迹，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国家的命运和

民族的前途。

中华职业教育社同我国民族工商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陈嘉庚、史量才、穆藕初、荣德生、荣宗敬、刘柏生、缪云台、刘靖基等著名实业家，都曾担当该社的理监事或赞助人。我国爱国工商业者的表率——胡厥文先生，现任该社理事长。该社曾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培养过数以万计的技术人才；它所开展的职业学校、职业指导、农村改进、劳工自治、职业补习教育、难民救济、伤残重建等事业，都曾得到过民族工商界人士的慷慨赞助。通过剖析这些活动，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近现代史中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中一支进步力量。黄炎培等职教社同仁在“五四”以前即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1919年，他们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热情赞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5年，他们创办《生活》周刊，该刊后来发展成著名的“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1931年“九·一八”以后，他们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他们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建立了直接联系，曾多方支持和协助党的工作；1941年，他们作为三党三派之一，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并当选为民盟的第一任主席；到抗战中后期，他们创办的《国讯》和《宪政》，已成为国统区进步人士要民主、要宪政的重要喉舌。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并写出《延安归来》，由社办“国讯书店”出版，此书大大增强了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他们还以《延安归来》的出版为先锋，联合重庆16家杂志掀起“拒检运动”，终于迫使国民党反动派撤消了对图书杂志的检查制度。1945年8月至12月，他们又参加发起“民主建国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

们参加了旧政协期间争取民主政治与后来的反独裁、反内战、抵制“伪国大”等斗争。1948年1月，他们在《国讯》上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方针，这标志着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在《国讯》被国民党查封以后，他们又接办了《展望》周刊，并主动请共产党人负责该刊编辑工作，使《展望》成为当时党在上海的唯一公开刊物。1949年9月，他们的代表黄炎培、孙起孟、冷遹、杨卫玉等，以民建会成员名义参加新政协，参与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在解放上海和上海解放后迅速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他们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新中国教育战线上的义务兵。在“职业教育”一度被打入冷宫的历史条件下，该社同仁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函授教育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同时，该社还担负了一些统战工作，曾帮助所联系的工商界人士过好社会主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方面都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在胡厥文、孙起孟、王昆仲等同志的领导下，职教社努力为蓬勃兴起的职业教育浪潮推波助澜，并继续在统一战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同志生前十分关心职教社。周恩来总理在出席职教社建社四十周年纪念会时，曾经指出：“职教社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从职教社所走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①，李维汉同志也在1982年指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历史，在一个侧面反映

^①《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了我国社会近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变化”^①，可见研究职教社社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在过去一段长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工作一直未能引起近现代史研究者们足够的兴趣，甚至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同志也不很重视这一课题。近一两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1985年4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职教社常务理事费孝通的专题文章，对该社进行了简略介绍。从1985年8月起，《文汇报》开辟出《中华职业教育社史话》专栏，以连载形式，分十次介绍该社历史。这些都表明职教社正在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著者写作本书，是想沿着周恩来和李维汉同志所指明的研究途径，力求对中华职业教育社（下称“职教社”）的七十年历史作一次比较深刻的反思，争取能比较系统、全面地整理出该社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脉络，并对社所容纳的这批老知识分子在我国教育史、革命史、思想史以及出版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上的贡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由于著者水平有限，也由于职教社社史的研究还是一个新课题，很多资料有待于进一步收集，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著者的意图不可能完全达到，甚至完全没有达到。著者殷切期待读者特别是了解职教社活动的文教界、工商界老前辈们，对此书的粗疏乃至错误之处不吝指教，以备日后进一步订正补充。

著者

1986年3月13日于北京寓中

①见《中华职业教育六十五周年纪念刊》第15页。

第一章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酝酿和成立

【—1917 年】

第一节 近代中国思想家们 所关注的两个问题

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靠鸦片和大炮冲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堤防，亡国亡种的危险已现实地摆到每一个华夏子孙面前。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势，沉闷多年的中国思想界终于从“皇朝永固”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巨旅程；在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救国之术”中，振兴实业与改革教育始终是两大重要课题。我们所要论及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基本理论，就是在前人对这两个重要课题的认识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为了正确地认识西方，曾组织人将一八三六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将《四洲志》底稿交给他的好友魏源，魏据此写出了著名的《海国图志》。这本书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西方的火轮、火车、织机等先进机械，第一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提出中国如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

长技”，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不论是兵器还是量天尺（天文仪器）、千里镜（望远镜）、龙尾车（车火）、风锯、火锯、火轮船、自来火（煤气）、自转碓（电磨）、千斤秤（起重机）等，都应当引进、制造。魏源发出了以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生产手段振兴实业的先声。

一八五九年，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洪仁玕发表了《资政新编》，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一个庞大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划，包括用近代化手段兴办工矿和水利事业、发展近代化的交通运输事业、开银行、设税务所等内容；同时他还提出了“兴学馆”的主张，这就接触到了为适应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改革教育的问题。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在所谓“同治中兴”的社会氛围里，萌生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幼芽。作为新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等，大声地喊出了“商战”的口号，他们认为“工者，商之本也”^①，“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②，所以必须“恃工为体，恃商为用”^③，通过他们的宣传鼓吹，振兴实业的重要性迅速地为国人所认识。同时，郑观应等人也看出工商业能否发达，与教育水平的高低关系甚大，而我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与“商战”对人才的需求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们建议设立工艺学堂、机器格致学院等，以培养实用人才，提高我国工艺水平，振兴实业。他们高呼：“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渐化其

①陈炽：《考工》，《庸书》外篇，卷上。

②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

③薛福成：《振百工说》，《庸庵海外文编》卷3。

贱工贵士之心”，中国教育改革的帷幕，由此渐渐地拉开了。

王韬等人的上述主张大多还停留在口头宣传的阶段，到了“戊戌变法”时期，这些主张经过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努力部分地变成了现实。康有为认为：“泰西之强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①，“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②，因此他把办学做为改良活动的起点，他主持的“万木草堂”，曾培养出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一大批维新派骨干，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说服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倡办实业和改革教育的法令，并以“上谕”的形式要求各地兴办农务学堂、茶务学堂、蚕桑公院等等；后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些法令和“上谕”却没被废除，在它们的保障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并诞生出一批实业学堂——这就是中国职业学校的前身。它们的问世，说明中国的教育改革已开始同“振兴实业”的目标挂钩，并预示着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即将诞生。

1902—1903年，清政府在壬寅（1902年）学制系统和癸卯（1903年）学制系统中都规定要设置各级实业学堂，这就在教育方面部分地继承了“戊戌变法”遗留的成果。1903年，张之洞在“兴新学”的浪潮中，为新派教育家代言说：“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③，后人对此评论说：“其用意与职业教育无殊，不过不以职业教育为言耳”^④。

①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四。

②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五。

③—④均引自舒新城：“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小史”《教育与职业》第100期，1928年版。

1911年，陆费逵在他主编的《教育杂志》上著文提出：“吾国今日，亟宜注意者有三。国民教育，一也。职业教育，二也。人才教育，三也”^①。“国民程度之高下，恃国民教育，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而国势之隆替，教育之盛衰，厥惟人才教育”^②。这是“职业教育”四个字第一次在中国人写的文章中出现。

与此前后，早已取代康梁而成为中国思想界开路先锋的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注重从政治上医治中国的痼疾，另一方面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振兴实业与改革教育的问题。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为他们迎来了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制度以后，孙中山曾一度“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③，他打算在中国铺设二十万里铁路，并开始构思一个宏伟的实业计划；他提出：“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④，中国人民“欲回复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⑤。然而，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孙中山不得不搁起了他那“扩张教育，振兴实业”的美好计划，把全部精力用来从事反袁的政治斗争。

由上所述，可见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的几代中国进步思想家，都把振兴实业与改革教育的问题视为挽救危亡、富国裕民的重要课题，其中有些人还将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付诸实践。当孙中山暂时无力顾及这两方面的工作时，另有一些民族

①—②引自舒新城“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小史”。见《教育与职业》第100期，1928年版。

③《陈英士致黄克强书》，《中国近代教育史》第232页。

④孙中山：《民国教育家之任务》。

⑤孙中山：《女子教育之重要》。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继续对这两个课题进行探索并将探索的心得运用于实际，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战友蔡元培和蔡的学生黄炎培，做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

第二节 蔡元培、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理论的探索

蔡元培，原字鹤卿，后改字仲申，别名鹤滨，又号民友，子民；浙江绍兴人。黄炎培，号楚南，后改号鞠之、任之；江苏川沙人。他们一向注重教育问题。黄炎培曾于1901—1902年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当时蔡元培是他的老师。有一次，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中国国民遭受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①。黄炎培说：“蔡师这几句话，我永远记着”^②。辛亥革命以前，蔡元培曾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力主改革教育，并创办了爱国学社、城东女校、丽泽书院等新式学堂，黄炎培则在这些学校里任教。此外，黄炎培还遵照蔡元培的教诲，先后创办并主持了川沙县小学堂、上海县广明小学、师范讲习所等新式学堂，并担任江苏省教育会的调查干事。蔡、黄师生两人，都成为当时享有盛名的“新派教育家”。

然而，正如当时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那样，蔡、黄二人的主要思想倾向乃是反清、革命。蔡元培是著名革命组织“光复

①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33页。

②载《八十年来》，原稿，未公开出版。

会”的创建者，后来又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实中国初期知识分子学生革命运动的重要发起人”^①，“替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不拔的根基”^②。黄炎培曾因“诋毁清庭”被判死刑，脱难后亡命日本，1905年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曾担任同盟会上海总干事；他负责收藏同盟会员的电码名单，接待廖仲恺等来往同志，并曾积极营救刘既震等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中，他参与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为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

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提出：“民国成立改造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人格”^③。黄炎培也认为：“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④。因此，他们很少再从事政治活动，转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黄炎培则以同盟会员的资格，担任了江苏省教育司长。后来他们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支持过孙中山，但基本上已脱离了孙所领导的政治集团。

蔡、黄二人的这种变化，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分化的表现。在当时及以后一个相当时期内，有很多知识分子感到民国成立后政治上仍然是一片黑暗，主要是民智未开所致，因而都热心于提倡教育救国。如天津的严修、张伯苓，上海的马相伯、湖南的朱剑凡、徐特立，福建的陈嘉庚

①吴玉章：《纪念蔡子民先生》，《中国文化》第1卷第2号，1940年4月15日。

②柳亚子：《纪念蔡元培先生》，《上海周报》第3卷第3期，1940年12月28日。

③蔡元培：《在爱国女校之演说》，《蔡元培选集》第49页。

④黄炎培：《东南洋之新教育》，商务印书馆1918年6月版。